许昌日报
2023年8月23日 星期三

寻禹·探源

（扫码观看视频）

（扫码观看图文）

（第18期）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

玉神面　　彩绘蟠龙纹陶盘　　中国最古老的观象台

寻禹·探源报道顾问团成员
（排名不分先后）

刘俊杰　具茨山上古文明发现者
教之忠　禹州市著名文化学者
何俊杰　浙江省绍兴市文史馆副馆长
王吉怀　蚌埠禹会村遗址工作队原队长
方燕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和王城岗工作队原队长
赵海涛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瓦店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
赵春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新砦工作队队长
刘海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陶寺遗址篇

陶寺遗址：最初的中国

■本报记者 邓雷 杨红卫 刘俊民/文 吕超峰/图

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一个普通的晋南村庄。

这块“隐姓埋名”几千年的土地，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接力发掘，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陶寺遗址目前已经发现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史前中亚最大的城址、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地……

中华文明起源，是从“禹传子家天下”开始绵延，还是从陶寺埋藏4000多年的遗址中寻找线索？传说中的尧都在哪儿？4000多年前是原始部落，还是有了初期的国家形态？

8月13日，寻禹·探源全媒体报道组带着这些疑问来到陶寺遗址，拜谒这片隐于广阔田野中的史前遗迹，走近远古的故国。

冯九生

史前古城遗址

20世纪50年代，陶寺遗址被发现。陶寺遗址总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一处重要的龙山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4300年至3900年。

1978年至1984年，考古队进行第一阶段大规模发掘，发现了大量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相近，可资佐证的遗迹和遗物，并确定了陶寺文化。

1999年至2001年，考古队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确定了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经过2002年进一步调查、发掘，考古队最终确定了陶寺中期城址之前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的存在。在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考古队在城址内东北部确立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址（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100年），发现了宫殿区、祭祀区等。

记者在陶寺遗址看到，这座40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已经回填，放眼望去，除了能看到一些明显的沟壑外，难以想象几千年前城址的原貌。

在遗址复原沙盘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特级技师冯九生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整个陶寺遗址的框架结构，生活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分布清晰，城址的水系在沙盘中也标注得十分醒目。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一片扁壶残片，残片断茬周围涂有红色，残片上朱书两个文字，其中的一个字为“文”，另外一个字专家们有“尧”“易”“命”等多种解释。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大家公认甲骨文是初步定型成熟的文字系统，但同时也认为在甲骨文之前还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这个残片上的朱书文字表明，在比殷墟早七八百年的陶寺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文字。这一发现对于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帝尧都城”之谜

《水经注》载“尧都平阳”，传说在今山西临汾一带。

冯九生告诉记者，经过几十年的发掘，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陶寺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它由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三部分组成，呈现出一个大城套小城的格局。小城里有宏伟的宫殿，宫殿核心建筑区出现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蓝彩白灰墙皮、陶板瓦、大玉石璜等普通居住区难得一见到的器物，显示出居住者的等级是最高的。

都城考古判定都城遗址标准有城墙、宫殿区、大型宗教礼制建筑（天坛、观象台、地坛）、王陵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和普通居民区。这些要素陶寺遗址基本都具备，学者又将考古发现与经典文献、地方文献、民间口传资料等四重证据相互印证分析，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

种种证据表明，陶寺统治者已有能力调动大规模的人力和物力来修筑城池，并且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它。可以判定当时已形成了国家，而气势宏大的陶寺城址就是其“王都”，即帝尧建都地平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曾表示，尧都平阳几成定论，陶寺遗址的性质为不断获得的新考古资料逐渐证实，陶寺作为尧的都城这一点在考古学界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共识。

墓葬揭示阶级分化

陶寺居民的部落公共墓地，在居住地的东南，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它的使用时间，大致同居住地相始终，发现墓葬1000余座，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这里的墓大致可分为三类——

大型墓长3米左右、宽2米多，随葬品可达一二百件，有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玉或石制的礼器以及整猪骨架等，已发现9座，不及墓葬总数的1%。中型墓长、宽尺寸略小，一般随葬成组陶器（包括少量彩绘陶器）、木器和玉、石器，几件至一二十件不等，常见猪下颌骨数个至数十个，这类墓占墓葬总数的近10%。小型墓墓坑小而狭长，一般长2米、宽0.5米左右，大多没有木质葬具和随葬品，这类墓约占墓葬总数的90%。

陶寺墓地各类墓呈“金字塔式”的比例关系，应是当时社会结构的反映。早期大、中、小型墓在规模和随葬品有无、多寡、品类、优劣等方面，差别已经十分显著，显示出氏族成员间的平等关系已被破坏，贵贱有别、高下依序的等级制度已经存在。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推测墓主应是掌握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部落首领人物。

冯九生认为，三种不同规格墓葬墓主的身份分别为首领人物、贵族和平民，其数量上的明显差异反映着当时社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比例关系，表明当时贫富分化极为悬殊。

最古老的观象台

记者在陶寺遗址现场看到一处特殊的“场合”：一座直径约50米的半圆形平台，上面立有13根石柱，这便是古观象祭祀台——陶寺文化重要遗址之一。

冯九生告诉记者，陶寺观象台不仅有祭祀功能，还是缜密的地平历观测制定历法系统。史前时期，天文学、历法是被王权垄断的，掌握农时就掌握了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命脉。

从复原的台址看，台座顶部有一半圆形观测台，以观测台为圆心，由西向东，呈扇状辐射着13根石柱（原址可能是夯土柱），从而形成12道缝隙。观测者直立于观测点核心圆上，透过石柱间缝，观测早上日切于崇峰山巅时是否在缝正中，如果日切在某缝正中，则是陶寺历法中某一特定日子。这12道缝中，1号缝没有观测日出功能；7号缝居中，为春分、秋分观测缝；2号缝为冬至观测缝；12号缝为夏至观测缝。除2号缝、12号缝各用一次之外，其余9道缝皆于上半年和下半年各用一次。也就是说，从观测点可观测到冬至—夏至—冬至一个太阳回归年的20个时节。

陶寺观象台有明确标识的观测点，与夯土柱构成地平历观测仪器系统。依据观测，可以确定粟、黍、稻、豆的农时和当地四季冷暖气候变化节点及宗教节日。

陶寺观象台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遗址。史前陶寺人据此制定的历法，是当时全世界已知最缜密的太阳历法，代表着当时天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是今天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直接源头。

丰富多彩的文物

在陶寺遗址现场，只能看到一片回填过的田野。为一睹出土文物的“芳容”，记者一行专程前往临汾市博物馆。

在博物馆展出的物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彩绘蟠龙纹陶盘，又称“龙盘”。陶盘质地为泥质褐陶，着褐色陶衣，外壁饰隐浅绳纹，内壁磨光，以红彩或白彩绘出蟠龙图案。图案中的龙蜷曲在盘中，龙头近盘口边缘，尾部位于盘中央，方头蛇身，身上有鳞甲，张巨口，口中伸出如同麦穗的长信子。冯九生介绍，龙盘仅在几座大墓中存在，其他墓葬中虽然也有彩绘陶盘，但没有龙纹。这足以说明在陶寺文化早期，龙已成为王权的象征，成了陶寺王国的“国徽”。

记者在博物馆展柜内看到一根长木棍和两块有刻度的木片，这是古代帝王在建国之前确立“天下之中”的工具——圭表，一套观测日影的天文仪器。陶寺遗址出土的“圭”，复原长187.5厘米，通身漆彩绘绿黑相间的色段刻度，第1—11号色段长约40厘米，合1.6尺，这是《周髀算经》所载的“地中”夏至晷影标准。测量时，把高“8尺之表”（地表以上200厘米）的木杆垂直立于地面，将有刻度的“圭”平置与“表”垂直，这样就可以测定“表”影长度了。

“玉神面”是陶寺遗址出土的最为神秘的文物。这件造型奇异独特的玉神面饱含幽远、陌生的气息，无声地注视着我们，被镂空的眼睛若有所思，目光与周围时空同步变化。专家解读，这是结合了人面基本相状、自然物象和族群崇拜力量的“神”，工匠用蝙蝠、飞鸟之类的形状作为装饰，又使其眼睛和嘴夸张起来，以表达先人内心对“神性”的理解。当然，其中不乏贵族们的旨意，用这种方式代表监看与命令的权力姿态。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中，还有大量的礼乐器，包括炊具、食器、酒器和鼍鼓、土鼓、特磬、陶铃、铜铃等乐器。据介绍，整个陶寺遗址中共发现乐器20余件，其中鼍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类乐器中最早的。这些乐器的出土，对于揭示4000多年前的音乐发展水平，探索礼乐制度的起源与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陶寺遗址发掘现场

编辑 杨 仪
校对 樊迎喜

夏文化新探索

马家窑文化高低耳壶

夏代的雕塑

赵春青

夏代的雕塑，既有圆雕作品也有浮雕作品。我国古籍中也有夏代雕塑品的记载，如《左传·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这里所说的“铸鼎象物”，已明确指出夏代有铜鼎，已被考古学实物——二里头文化青铜鼎所证实。

在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有铜蟾蜍雕塑作品。在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有陶鸟作品，编号为IVT1H14:2，泥质褐陶，手制，鸟嘴和尾稍残，有双翅，残长3厘米，最宽2.5厘米，高3厘米。瓦店玉蝉（报告称为玉鸟），编号为IVT4W1:4，墨绿色玉，圆雕，头、嘴写实雕刻，双翅用线刻纹表示，圆锥形尾部钻一圆孔，长6.3、直径1.5、孔径0.1~0.4厘米。新砦遗址出土的彩绘陶鸟，可能是权杖头，而猪首形陶器盖则可能是一件祭祀用品。

二里头遗址的陶塑仍以陶器盖钮或把手的装饰为主，用圆雕或半圆雕方式表现羊头、狗、鸟、鱼、龟、蛤蟆等动物形象。如一件环耳把手上雕刻出一个独立的羊头，突出表现了羊的嘴和角，造型小巧，生动有趣。鱼是小型圆雕作品，龟和蛤蟆是半圆雕作品，蛤蟆塑造的形态肥胖，背部还戳印着密集的小圆圈，给人一种真实感。

二里头遗址晚期发现的陶器和陶片上的刻画花纹有龙纹、蛇纹、鱼纹、蝌蚪纹和人像等。龙纹有的周身有鳞，头上有眼睛，身下有利爪；有的是一头二身的形式，龙头下饰有云雷纹，龙身下画着一只小兔，线条内还涂有朱砂，龙眼内填有绿色颜料。蛇纹有蜷曲的，也有两头一身的形式。刻画的线条流畅，手法熟练，表现了较成熟的装饰技巧。

驻马店杨庄遗址出土一件“龙”纹陶雕塑。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中发现的陶器上所刻画的圆圈、圆点、涡纹等图案装饰，也可以算作雕塑艺术品之一。

石雕发现不多，主要是用于小件装饰品。如一件羊头石杵形饰，在上端用浅浮雕形式雕出一个羊头，突出表现了羊的弯角，省略了眼、耳、鼻等细部，造型简练。

在与夏代年代相当的一些边远地区考古文化遗存中，还常见雕塑艺术品。如卡约文化的铜杖首，雕塑有两件翘尾、竖耳、圆睛、前伏的惊觉双犬，形象生动。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通体饰满华丽纹饰的彩绘陶鬲、石峡文化出土的带流壶等，都是雕塑艺术品。

大禹像